



张中行
著

清
风
明
月



清 风 明 月

张中行
著

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风明月/张中行著. —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 2007. 2
ISBN 978-7-5002-2475-4

I. 清… II. 张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18014 号

清风明月

著 者: 张中行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 100165

电 话: (010) 83895215 83896965

印 刷: 北京文海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20

字 数: 172 千字

印 张: 12

版 次: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 5001—9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002-2475-4/I·434

定 价: 22.00 元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
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常人·哲思·诗情

——张中行先生其人其文

与张中行先生交往有年，得先生精神、物质的恩惠多多，也写过几篇关于先生的文字，但都不过只言片语，且多叙交游之事，很少评断之语——以我的缚鸡之力，焉敢有昇泰山之想？先生逝世后，与张厚感、李世中二君共同起草先生讣文，也只是勉力为之，在先生大名前写了“著名语文教育家，学者、作家，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”几个词。这并非吝于语汇，而是因为，要把先生说清楚，确如孟子所说：“难言也。”——先生的一生，远非这几个词所能概论。

张先生首先是一位常人。小民百姓，平常得与胡同口遛弯儿、负暄话旧的老头儿没什么两样。走在大街上，任谁也看不出这是一位声闻全国的大学者、大作家。他喜欢吃烤白薯，喝稀粥，兴到时偶尔来一杯小酒，也不过二锅头而已。世界杯期间，也和小青年一样，深夜起床看球……他的身份，终其一生，只是一介平民。然而，翻阅先生文集，便能发现，他的精神世界竟那么丰富！这一点，却又非同寻常了：哲理，情思，学问，诗文，古典，语文……从内容到形式，贯通中西，诸体兼擅。当年，他以耄耋之年出现在学界之际，难怪人们惊呼：“原来我们还有这么一位文化老人！”

张先生是一位思想家，一位哲人。百岁人生，饱尝苦乐，阅历丰富，自称“六代（满清、北洋时期、国民政府、沦陷时期、抗战胜利、建国以后）之民”，这使他具有了超越常人的岁月财富。数十年间，先生孜孜矻矻，不断追索，妙悟人生真谛，成就了他熔铸古今的“顺生”（率性任情而生）哲学。同时，他又是一位学人。一九三五年红楼毕业，真正的“老北大”出身，广泛涉猎中外群籍，博闻强志，腹笥充盈。在治学上，他接受了老北大的“怀疑精神”，对各种复杂的社会人生问题，敢于独持己见，决不随波逐流。此外，他又继承了老北大“民主”“科学”的现代理性精神，对传统文化中的专制、迷信，不遗余力地给予无情的批判。在生命的后十几年里，他以高迈之年，不辞劬劳，苦口婆心地著书立说，倡导法治，力主以“文”化育生民的心内之思，以“法”规范其身外之行，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。在思想体系和文化人格上，能够传承“五四”道统的学人寥寥，先生无疑是其中一座重镇。

这样说，先生似乎就成了一位苦行僧式的书斋学究，或者是一位怒目金刚式的斗士。其实不然，他还是一位诗人。诗人之称，有表、里两层含义。表，指能作诗之人。这一点，先生自当不让，有旧体诗词集《说梦草》为证；深层含义，是重情。多年接触所感，是他有丰富、深挚的情感世界。凡人生美好的东西，哪怕是些微小事，甚或片瓦残砖，他都怀有发自内心的挚爱。他的散文，追怀往事，悼古伤今，系情故事，关心民瘼，成为主要题材。字里行间充满沧桑之慨，饱含人生哲理，令人荡气回肠，寻味不尽。那些大量的怀古忆旧之作，举凡人、事、情，都饱含对往昔美好的记忆，对当今丑恶的鞭挞。他自称“是当作史和诗来写的”。从这个角度读，庶可真正明了先生的用意所在。

清代学者魏禧为周亮工《赖古堂集》所作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
士之能以诗文名天下、传后世者，有三资焉，曰记览之博也，曰见识之高也，曰历年之久也。记览博，则贯穿经史，驰骋诸子百家，书无所不读，言有本而出之不穷。见识高，则不依傍昔人成见，不汨没世俗之说，卓然能自成立。历年老，则积久而变化生，攻苦而神明出。

先生工于三者，倘再加上“重人情”一项，用以形容其人，庶几仿佛之。

再说张先生之文。多年来，他执笔，固守“忠于写作”的原则。不写则已，写则以真面目对人。其文如行云流水，如话家常，举重若轻，含蓄蕴藉，平实自然，冲淡而不失韵味，灵动而兼有厚重，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。在当今文坛，可谓独树一帜。

如今，先生已去周岁矣。“临川悲逝水，抚卷忆慈颜。”先生的音容不再，无处亲临警欬，唯以阅读先生的文章，来重温往昔的春风岁月了。每及此时，不禁恍然。

在先生的影响下，这些年来，我每于教务馀暇，率尔操觚。但我深知自己人、力之微，从没给人写过序，更没想过给先生的文集写序——小子何能，竟敢乃尔！这篇小文，不过应编者之邀，把我读其文、近其人的一点浅近心得，与大家共享或予大家供评而已。焉敢序为？

刘德水

二〇〇七年二月一日凌晨于三馀书屋北窗之下

目录

卷一

篱下负暄

- 2 红楼点滴一
- 6 广化寺
- 10 圆明园劫灰
- 14 由旧书想起的
- 18 砚田肥瘠
- 23 北大图书馆
- 28 我的琉璃厂今昔
- 33 老字号
- 39 身后名
- 44 安苦为道
- 49 阅微草堂
- 53 酒
- 62 日记
- 67 戏缘鳞爪
- 75 剥啄声

卷二

禅外顺生

- 80 宇宙和人生
- 82 以逆为顺

目 录

84	通往禅悟的路
87	求顿悟的新路
91	得道和望道
93	生 命
96	命 运
100	节 制
104	机 遇
108	恋 情
114	信 仰
121	顺 逆

卷 三

梦 屑 琐 语

128	旧迹发微
133	降表之类
136	杞忧小记
140	一瓶人头马的烦恼
143	清风明月
147	读书的范围
149	不求甚解
151	不过横塘路
154	惜墨如金
156	得失寸心知

目录

卷四

言文之道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160 | 文言有使人喜爱的力量 |
| 164 | 文言的读音问题 |
| 169 | 学以致用问题 |
| 176 | 白话的特点 |
| 182 | 划界的原则及其运用 |
| 186 | 展 望 |
| 193 | 读 诗 |
| 203 | 读 词 |
| 209 | 勤和慎 |
| 214 | 言为心声 |
| 220 | 采花成蜜 |
| 226 | 修 改 |

卷一

簫下負暄

红楼点滴一

广化寺

圓明園劫灰

由旧书想起的

砚田肥瘠

北大图书馆

我的琉璃厂今昔

老字号

身后名

安苦为道

阅微草堂

酒

红楼点滴一

2

民国年间，北京大学有三个院：一院是文学院，即有名的红楼，在紫禁城神武门（北门）以东花园（沙滩的东部）。二院是理学院，在景山之东马神庙（后改名景山东街）路北，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，京师大学堂所在地。三院是法学院（后期移一院），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。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，四层的砖木结构，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。民国初年建造时候，是想用作宿舍的，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。文科，而且是教室，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。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，其余如刘师培、陈独秀、辜鸿铭、胡适等，就几乎数不清了。人多，活动多，值得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。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，要分类。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。

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，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—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。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，或者说无孔不入，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。课堂，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，规矩都是严格的。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，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，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。这说得鲜明一些

是：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，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。

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。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。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，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，却是名声在外。这是一方面。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，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，还有些人，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，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，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。这也是一个方面。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：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，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。同坐一堂，摩肩碰肘，却很少交谈，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。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，都自以为有一套，因而目中无人。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，因为都漠不相关，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，就不会有人看，更不会有人盘查。常有这样的情况，一个学期，上课常常在一起，比如说十几个人，其中哪些是选课的，哪些是旁听的，不知道；哪些是本校的，哪些不是，也不知道。这模模胡胡，有时必须水落石出，就会近于笑谈。比如刘半农先生开“古声律学”的课，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，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。还有一次，听说是法文课，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，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。教师当然很恼火，问管注册的，原来是只一个人选，后来退了，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，所以便宜了旁听的。

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。据我所知，上课时间不上课，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，像是很少。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。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，如“党义”；有的课，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

大差别,可以不重复;有的课,内容不深,自己所知已经不少;等等。这类不上课的人,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,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。因为这样,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,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;在教授一面,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,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,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。不常上课,有旷课的处罚问题,学校规定,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,不考不能得学分,学分不够不能毕业。怎么办?办法是求管点名(进课堂看坐位号,空位画一次缺课)的盛先生擦去几次。学生不上课,钻图书馆,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,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。

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,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,比如,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,加在前门的门槛上,就是一种。这评论的意思是,进门很难;但只要能进去,混混就可以毕业,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。其实,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,是进门以后,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,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,这就是学术空气。说是空气,无声无臭,却很厉害。比如说,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,学生,即使很有钱,也不敢西装革履,因为一对照,更惭愧。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。

时间不很长,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。又不久,国土被侵占,学校迁往西南,同清华、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。一晃过了十年光景,学校返回旧居,一切支离破碎。我有时想到红楼的昔日,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?记得是一九四九年四月,老友曹君来串门,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,每次放映幻灯片,很有意思,他听了几次,下次是最后一次,讲杂建筑,应该去听听。到时候,我们去了。讲的是

花园、桥、塔等等，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，小巧曲折，很美。两小时，讲完了，梁先生说：“课讲完了，为了应酬公事，还得考一考吧？诸位说说怎么考好？”听课的有近二十人，没有一个人答话。梁先生又说：“反正是应酬公事，怎么样都可以，说说吧。”还是没有人答话。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，于是说：“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。请选课的举手。”没有一个人举手。梁先生笑了，说：“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，谢谢诸位捧场。”说着，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。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，而散。我走出来，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，心里觉得安慰。

广化寺

广化寺是北京北城鼓楼以西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佛寺，寺前（南面）有守门双石狮和红色大照壁，如果没有这个照壁，就正好面对后海。照壁之外是空地，有两层楼高的土丘，土丘之东有两个水池。如果借周围景色来吹嘘，说是城市山林也不能算妄语。寺的规制是完全依照传统：前有山门、弥勒殿，中有大雄宝殿，后面是楼，两层，下是禅堂，上是藏经阁；还有东西旁院，西院住人，东院存物。

三十年代后期，由于偶然的会，我迁到寺的西邻李家院内。这李家占据寺的西南一角，我住后院，房后就是寺的方丈院。北京有个迷信，是宁住庙前，不住庙后，宁住庙左，不住庙右。我住的是庙右，所以曾有好心的长者指出我卜居的失计。其时我已经受了西学的沾染，就不以为意，还是住下来。因为成了近邻，对于寺的身世就颇有兴趣。查志书，寺的家世并没有多少显赫的，只说有明朝崇祯皇帝赐曹化淳的御笔草书碑，可是我没见过。可见的是清朝末年一些痕迹。据说寺的大施主是恭亲王奕訢，他每天下朝，总是先到

广化寺休息。这大概是真的，有不少蛛丝马迹可证。寺有十顷香火地在北京和通县之间，自己雇人耕种，寺靠这个支撑门面，僧人靠这个吃饱肚子，这样多的土地，推想必是超级人物施舍的。大雄宝殿里有个紫檀雕的供桌，大而精致，殿东偏有个青花瓷鱼缸，也是大而精致，据说都是恭王府中物。直到四十年代，奕訢的孙子溥心畬，其时已是名画家，还常常到寺里来消夏，所以寺里僧人几乎人人有溥的赠画。再有清末民初，寺还是北京图书馆的发祥地，其时名京师图书馆，馆长是名目录学家缪荃孙，读者更不乏知名之士，其中之一是鲁迅先生。

我结邻的时期，图书馆已经迁走三十年以上，仅存的书香是藏经阁上的经版和散见于各室的佛经。这同我家的生活简直是水米无干。有干系的是每天清晨和尚上殿的念经声，不知怎的，总使我想到世间和出世间。孩子们睡得沉，听不见梵呗声，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一年一度旧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，寺门口放着纸糊的大船，法事之后要烧，烟火冲上半天，很好看。其次是冬天，有的年头在寺里开粥厂，排队领一碗稠粥，不要钱，孩子们觉得很好玩。

四十年代中期，一个朋友赵君迁到寺内东院住。他同寺的住持有交谊，因而经过介绍、交往，我同寺里的许多人就渐渐熟起来。大小和尚认识不少。说到所得，很遗憾，即使有，也是偏于消极方面的。比如我写过一篇小文章，谈出世，分析的结果是，以逆人情为顺教义，即使并非绝对荒诞，也总是非一般人所能做到。坐而能言，起而不能行，作为人生之道，其价值就微乎其微了。这样的认识，或说感触，一部分就是来自与出家人的交往。不过，依古训，我们也不当厚责于

人，证涅槃高不可及，可以降而求其次，出了家，真能够信受奉行的也未尝不可传。这方面，有三位似乎可以说一说。

一是方丈玉山，河南人，因为朴实而当了住持，即所谓一寺之主。他文化程度不高，不要说法相，就是寺里标榜的临济宗，恐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但他信，无理由地相信依清规做就是好。寺很富，内有很高明的厨师，据说其中之一是来自御膳房，外出有人力车和马车。可是他向来不坐车，远近都是步行。吃斋，寺里有规定：除初一、十五改善，吃白面面条以外，平时都是玉米面窝头。他随着小和尚吃，不特殊。上殿念经也是这样，从来不贪睡缺席。因为他这样规规矩矩，解放以后受到优待，分配他到东郊某工厂工作。有一次我遇见他，问他在厂里做什么，他说喂猪，接着立刻说明：“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，反正我不杀生，不吃肉。”后来，他年岁渐大，厂里照顾他，让他值夜班。有一天早晨，我见他从小厂里回来，问他为什么不在厂里就近休息，他说：“出家人只能在寺里睡，这是清规，决不能犯。”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，我没有再看见他。七十年代中期听一个旧邻人说，他因为患什么病，死在寺里。

另一位是了尘，东北人，我四十年代认识他，他已经近七十岁。人瘦小，和善。我曾问他的经历，他说是刻木板的工人，因为觉得奔波劳碌没意思，所以出了家。他安静，不大说话，我看他那凝重慈祥的目光，总觉得他在想：“我虽然已经觉悟，却原谅你们的迷惑。”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正是《高僧传》里的人物。大概是五十年代初期，他离开这个寺，推想也早已不在人世了。

还有一位是修明，俗姓贾，北京人，经历与前两位大异。他既在